

“双城记”与“两都赋”：

张恨水笔下北京与南京的时空体

王 谦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安庆 246011)

摘 要:张恨水小说中的北京与南京所形成的“双城记”,展现了两座古城不同的城市面貌与社会空间,勾勒了“城与人”的独特联系。通过以《两都赋》为代表的散文,张恨水发掘了北京与南京的美学与人文特征,营建了“两都”的文化空间,显示出“两都”远离都市现代性的乡土气息、艺术风格与人文气质。结合不同历史时期张恨水的创作处境、外部环境,可将张恨水作品中的北京与南京视为一个完整的时空体。张恨水笔下北京与南京的时空体,暗含着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转型与变迁。

关键词:张恨水;北京;南京;时空体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3)01-0077-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30108

在张恨水的写作生涯中,城市既是她主要的生活空间,也是她作为新闻记者的观察对象,进而成为她文学创作的叙述主体。从早期写北京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到抗战时期写重庆的《巴山夜雨》《傲霜花》等,在他数十年所积累的作品中,北京、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城市都得到了精彩的呈现,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相关的专题研究。^[1]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的只以张恨水的小说为考察对象,没有讨论张恨水散文中的城市书写;有的只是分析张恨水的单一城市写作,缺乏对比研究的视野。本文正是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起点,从空间旅行与对比研究的立场出发,结合共时与历时的研究方法,讨论张恨水小说与散文中北京与南京的文学书写。

北京与南京这两座城市都曾是历史上的都城,在现代中国又先后做过国都,在转型时期的现代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典型意义。张恨水分别在这两个城市有长期的工作、生活经历,写北京的有《春明外史》《天上人间》《现代青年》等小说,写南京的有《满江红》《丹凤街》《秦淮世家》等,另外还有一组将北京、南京进行对比书写的散文集《两都赋》。本文将张恨水笔下的北京与南京进行对比,从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的角度考察张恨水对“城”与“都”的不同叙事策略,进而借助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审视张恨水笔下北京与南京的多重意义。

一、“双城记”:北京与南京的社会空间

(一)北京城的全景扫描

在现代中国的文学书写中有很多“双城记”,书写着“城市”与“人生”的双重记忆,如老舍笔下富含

收稿日期:2022-10-14

作者简介:王谦(1982—),男,安徽潜山人,文学博士,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

基金项目:2022年度安徽省高校科研基金项目“张恨水的空间叙事研究”(2022AH050996)。

浓郁京味的北京与充满生活气息的济南、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立场所观察的北京与青岛等,若就呈现“双城”空间的立体感与历史感而言,张恨水笔下北京与南京的“双城记”似乎更为突出、特别。在现代文学史上,能将国家的都城(北京、南京、重庆)都形之笔端的,张恨水是较突出的一个。就北京与南京而言,张恨水在这两座城市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因而能较大程度的重现“双城”的历史风貌与社会现实。张恨水笔下北京与南京的“双城记”既有延续又有不同,在展示“双城”独特的城市风貌与社会空间的同时还间接折射了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张恨水早期写北京的几部长篇小说如《春明外史》与《金粉世家》,正值北洋军阀在北京轮流执政,张恨水生动地再现了北京作为传统城市在现代性与新兴政权的双重影响下所表现的光怪陆离,为读者呈现了不同于“摩登”上海的城市景观。不同于本土作家老舍对北京底层社会的精细刻画,也异于沈从文等京外作家对北京社会的印象式描绘,张恨水笔下的北京“城记”更接近“全景”式的扫描。

张恨水初至京城时所从事的新闻编辑工作,使他对北京采取一种“向上”的观察视角,以一种猎奇的手法来记录北京上层社会的日常与秘闻,特别注重挖掘北京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社会性。民国初年,张恨水虽身在北京,但作为新闻记者的他更乐于为读者描绘现代北京的城市“奇观”,而不是那些象征古都北京的传统遗存。在张恨水早年的北京叙事中,频繁出现的是中央公园、城南游艺园、真光电影院、劝业场、青云阁、新世界等消费娱乐空间,这与民国初年北京的城市现代化进程是大体相符的。^[2]从底层胡同的妓女遭遇,到军阀、部长、议员、总理的生活秘闻,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都若有所据,民初北京的政界、学界、新闻界、娱乐界等通过新闻在张恨水北京小说中串联而成的社会空间,可与当时报纸上的新闻、广告所呈现的内容相参照,这种现时的实录笔法,是对民初北洋政府管治下北京社会的真实再现,以致有人谓之多有现实影射,将之视为民国北京的野史。^[3]因此,张恨水小说中的北京“城记”,并不完全是书写一个地方性的文化古城,而是并置了现代与传统的空间想象的综合体,特别是张恨水早期小说中的北京,极尽现代国都的繁华与热闹,在突显北京的城市现代性上尤为用力,因而有学者说早期的张恨水是“描写北京都市现代性最为出色的作家”^[4]。

(二)南京城的平民社会

相比之下,在张恨水南京的“城记”却呈现了另一幅社会面貌,南京的城市空间符号没有得到特别的突出,小说所呈现的南京城市空间、城市意象也是模糊的,城市的现代性退场,描写城郊及乡村空间的场景增多;城市的现时感也似乎故意被模糊了。尽管张恨水在南京时仍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办有《南京人报》,但彼时作者面临的写作环境与在北京时已大不相同,在内忧外患中“苦撑”。^{[5]78}因此,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国都北京生活体验之后,张恨水并未像早年书写北京“城记”那样将目光聚集在上层社会、政府秘闻,尽管作为“新首都”的南京不乏此类创作素材,他在《秦淮世家》中也揭露南京政府官员的腐烂与罪恶,在《燕归来》《秘密谷》等小说里,也写南京的都市青年、大学生的现代性生活,但张恨水更关心的不是南京的上层社会,而是一个底层的、世俗的南京。对底层社会与平民阶层的浓墨刻画,暗藏着张恨水对南京城市现代性的有意遮蔽与对南京社会现实的批判。《丹凤街》中的童老五在南京的生活难以为继,认为“这城里的人性可怕”,^{[6]100}只得带着老母亲躲到乡下去了,在茶馆里卖茶的伙计洪麻皮也因受不了老板的气,辞了工作回到农村。在童老五眼中,南京是一座“死城”,“死城”之名亦是数十年前徐志摩在批评北京的称谓,^[7]张恨水借底层平民之口来批判南京的社会现实。

在现代中国,曾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的北京与南京的“城记”书写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城市的政治象征问题。如何处理城市的政治性(国家性)与地方性的关系,表征了作家对城市文化与身份的认同与理解。张恨水早年观察北京的特殊视角,使他的北京书写意在突出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符号属性,而不关心作为地方北京的个体性,“国都北京”与“地方北京”两者之间多是重叠的,因此,张恨水的小说中存在两个北京,一个是以先农坛为表征的文化古都、以天桥为代表的地方性城市,一个是以国会、城南游艺园为代表的现代国都,这两者重叠、交织于张恨水的北京“城记”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张恨水北

京叙事的地域性与文学风格,当代学者宋海东认为张恨水未出版的北京题材小说《第二皇后》可归入“京味小说”,^{[8]127}但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一书中却将张恨水排除在京味作家之外,董玥在讨论民国知识分子、民俗学家与老舍的北京书写时,也未提及张恨水的北京写作,^[9]可见张恨水小说中的北京在城市形态、地域风格、文化品味等方面都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张恨水在书写南京的“城记”时,民国政府已将国家首都由北京迁至南京。与张恨水早期北京叙事强化国都北京的现代性、政治属性不同,张恨水更注重南京的历史性——作为数代古都的文化价值,然而,现实的南京(“新都”)与历史的南京(文化古都)却在张恨水的小说中出现了分裂,新与旧、现实与传统都在张恨水的南京叙事中产生了落差。这种落差在象征南京的典型城市空间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满江红》中,由北方初至南京的青年画家于水村对南京的总体印象是“看不出六朝遗迹,倒真有些清凉意味”。^{[10]1}想象中的夫子庙在现实中被种种小摊包围,毫无古色古香的意味,而历史悠久的秦淮河“却是一条大臭阳沟”,^{[10]15}这明显不符合时人对于六朝古都的想象,也不符合张恨水对南京作为彼时国家首都应有气派的期待,在与曾为国都北京的对比中产生了心理落差。

(三)城与人的互动

如果说现代性与政治性表征了“城记”的外部社会空间,那么城与人的命运互动则是“城记”的内部灵魂。张恨水不像老舍专写北京人,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来自京外的寓京者、过客,或是像《啼笑因缘》中樊家树那样的来京求学的大学生,或是像《春明外史》中杨杏园之流寄居在北京各会馆的谋食者,要么就是像《金粉世家》中籍贯各异的大家族。在张恨水早期的北京小说中,各类典型人物相继登场,资本家、银行家、新闻记者、歌女、妓女、姨太太、公子哥、摩登女郎,这些处于转型时期的现代中国所特有的复杂人物并非北京所独有,但张恨水将之浓缩于民初的北京叙事,使其笔下的北京人呈现出万花筒般的多彩斑斓。直到《天上人间》中张恨水才将视角转向底层平民,到后来的《啼笑因缘》《艺术之宫》《美人恩》《夜深沉》等则进一步加大对北京普通市民的着墨,诸如大学生、教授、女模特、戏子、捡煤核的穷人、车夫等,无所不包,近乎北京社会的人口百科全书。早期张恨水笔下的各色人物基本都是寓京的游客,像《美人恩》的小南、《艺术之宫》的秀儿、《天河配》的白桂英、《天上人间》的玉子、《夜深沉》的王月容那样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主要都出现在张恨水后期的作品中。不论是外省来京的过客,还是本土大杂院中的平民,都在北京城里讲述着“五方杂处”的北京“城记”。

张恨水的南京“城记”则专门着力于刻画南京的城市平民。在小说《丹凤街》中,张恨水并没有去发掘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雍容华贵与悠久历史,而是把目光投向社会的底层,突出南京的“烟水气”与“铜臭气”;张恨水对六朝人民的“优柔闲逸、奢侈及空虚的自大感”并无好感,^{[6]1}却对丹凤街上的市井平民饶有兴趣。一条市人逐利的丹凤街,就是南京世俗社会的缩影。在《秦淮世家》中,张恨水用“老夫子庙”与“夫子庙规矩”来指涉南京的平民社会,正是夫子庙的“规矩”维系着南京历史、民俗、地方社会的既有平衡,因此,当强买歌女的政府官员杨育权打破了这种“规矩”时,立刻引起了秦淮河平民的反抗。

张恨水对南京底层社会与平民阶层的刻画与老舍对北京的市民观察有异曲同工之妙,张恨水在《天上人间》《啼笑因缘》《艺术之宫》《美人恩》等小说也写北京的贫民,他写天桥的民间艺人、胡同里大杂院的贫民生活也能细致入微,但仍有一个北京上层社会与精英群体与之对应。在南京“城记”中,张恨水将社会底层平民作为小说的主角,形成了南京社会的平民群像。《丹凤街》最早以《负贩列传》之名登在《旅行杂志》上,“负贩”即为流动卖货的小商贩,小说以一条街道来统摄南京社会,与老舍以小羊圈胡同来象征北京社会如出一辙。为“小人物”作传,表明张恨水观察社会视角的转变,《丹凤街》中放印子钱的混混梁胖子,卖开水为生的田侏子,卖小菜的童老五、李牛儿,以及《秦淮世家》中夫子庙一带的王大狗子、赵胖子、刘麻子、毛猴子等,这些来自五行八作有姓无名的街巷市民们构成了张恨水笔下南京市民的群像。他们中有势利的小市民,有被迫害的歌女,有本性善良却被生活所迫去偷鸡摸狗的城市游民,有为救助朋友能挺身而出、不顾性命、颇有江湖侠义的无名小贩,张恨水通过一群平民的日常肖像绘

制了南京的城市人文画像。无论是“负贩”聚集的丹凤街,抑或是仍守着旧时“规矩”的夫子庙,还是容留三代妓女谋生的秦淮河,都体现了张恨水对南京城市气质的真切理解。至此,张恨水的南京叙事显示了其不同于北京书写的独立风格。

从民国国都到故都北平,北京城的身份在变,张恨水的北京叙事策略也随之调整,从对国都北京现代性的突显转向对古城北平的细节刻画。从早期的《春明外史》开始,到国都南迁后的一系列北京小说,张恨水的北京“城记”从早年的记者视角逐渐向北京本土视角转移,从政治视角(官场)转向平民视角(下层社会),所呈现的城市空间从早期的会馆、大酒店、商场、跳舞场等公共空间逐渐向胡同、大杂院等平民空间转变,写作立意从国家意识、社会意识向本土意识、地方意识转变,从而描绘出一个比老舍笔下更为整体、全面的北京社会,几乎可与城市史相对读,因此有学者认为,“假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从城市生活的角度,通俗小说家很可能提供了更为精彩的细节。”^[11]张恨水的北京小说无疑可以当成民国北京的社会文化史来读。及至张恨水南下至南京时,南京已成国家的“新都”,外部环境形势的变化使他已无暇去探查南京政权及其上层社会,转而将观察的目光移向了南京的街头巷尾,对南京的历史性、城市现代性的淡化,对市民阶层的浓墨重笔,再加上后期抗战因素的加入,使得张恨水的南京叙事夹杂了阶层对抗的情绪,而南京也成了—个充斥着压迫与反抗的“死城”“愁城”,至于后期的抗战小说如《大江东去》《八十一梦》,则使张恨水的南京“城记”弥漫了一层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

从北京到南京,从观察视角由“向上”向“向下”的转变,从囊括整个北京社会到侧重刻画南京的下层社会,从传统的言情笔法到向新文学靠拢,回顾张恨水笔下的现代北京与南京的“双城记”,几乎可与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狄更斯笔下的伦敦相对读,张恨水对现代北京、南京的刻画与描摹,以通俗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对“双城”社会现实的全景透视,为我们展现了两座古城不同的城市面貌与社会空间,从侧面形象地记录了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呈现了现代中国转型时期“双城”中形形色色的典型人物的特殊命运,勾勒了“城与人”的独特联系,在看似“实录”的笔调之下,隐藏着张恨水讽刺现实、批判社会的人主义情怀。“双城”的记录可谓现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空间的折射。

二、“两都赋”:北京(北平)^[12]与南京的文化空间

(一)“两都”的出场

如果说张恨水在小说中营构的现代中国“双城记”从社会、历史的层面上呈现了北京与南京的个性与差异,那么在散文的平淡叙述中,张恨水则为我们发掘了北京与南京的相通之处。在小说中,无论是北京还是南京,因为叙事的需要,因为塑造人物的需要,因为小说艺术形式的需要,城市本身未能受到特别的注意;反倒是当作者离开这两个城市之后,关于北京与南京的体验与记忆才在他散文的温情细语中逐渐清晰起来;在小说叙事的“双城记”中,张恨水更注重借助城市来挖掘北京与南京的社会空间,描绘人在社会、城市中的不同命运,城市本身是背景;在散文中,城市自身成为张恨水重点描绘的对象,由背景走向了前台。在这点上,张恨水体现出了与其他都市作家的不同。在老舍的城市书写中,北京既是背景,又是写作对象,在融合城市的叙事功能与彰显城市自己的文化特质方面,老舍笔下的北京是独一无二的。张恨水只有在《天上人间》《似水流年》《丹凤街》等少数小说中,用白描的手法把城市本身推向前台,在其他情形中,城市都是背景烘托。他的散文创作弥补了这一缺憾。

1937年底,张恨水为躲避战祸离开南京溯江而上,避居山城重庆。山河变异与故园之思的多重影响,唤起了他对北京、南京两处都城的生活记忆,他把这些鲜活的生命体验都写进了《两都赋》之中。《两都赋》写于抗战时期的重庆(1944—1945),共26篇回忆性散文,发表在重庆的《新民报》上。用“赋”名之,显然与班固的《两都赋》、左思的《三都赋》在命意上形成互文,表明张恨水对北京与南京在小说叙事之外采取了不同的书写策略;用“都”而不用“城”,隐含着张恨水对两者的特殊情感。

“城”是一个空间概念,指向的是社会、经济、生活,“都”则暗含了时间与政治,承载着历史与文化。在现代中国,较早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海、天津、大连等都称得上是现代化的“城”,唯北京、南京、重庆三地能为“都”,但重庆之为“都”又过于短暂,无历史遗风。张恨水在临时陪都重庆来记忆、书写北京与南京两个旧都,不仅是历史的奇遇巧合,也是他经历了这几个城市空间体验之后对于都市现代化的重新理解而做出的文化选择。

“两都赋”^[13]不同于“双城记”的鲜明之处是张恨水故意淡化北京与南京的政治象征属性与社会差异,转而注重城市自身的细节,努力发现两地之间的共性。张恨水将“两都”并“赋”,显然不同于在“双城记”中的实录手法与批判态度,而是在时空距离的现实中,在想象与记忆中对两个都城进行审美反刍,重新发现、体认“两都”的艺术性、乡土性与人文性。

(二)“两都”的艺术美

用“赋”的笔法来重新书写城市,表明张恨水观察城市、记忆城市的重心由原来的注重城市功能与都市现代性转变为注重城市的审美属性与艺术性。早在国都未迁南京之前,张恨水就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北京的市政建设与城市卫生问题,彼时张恨水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自然以“首善之区”的标准来评价北京,用现代都市的标准来衡量国都北京亦在情理之中;直到北京失去了国都的地位后,张恨水才逐渐静下心来发现城市自身的艺术价值。在写于1930年的小说《似水流年》中,张恨水就借外省青年黄惜时之口道出了北京城的独特美感:“北京这市上,随时随地,很容易地发现东方之美,只是市政办得不好,无处不脏,把美点常是埋没掉了。”^{[14]244-245}

在《两都赋》之前,张恨水就曾在《天安门》一文中称赞天安门至中华门、正阳门一带独有的空间构图美以及古都建筑所代表的东方艺术美。^{[15]237-238}这种对城市的审美回归与情感倾注在《两都赋》中变得更加强烈,在这26篇散文中,张恨水毫不掩饰自己对两个古都的欣赏与赞美,赞扬城市的风景与建筑,饱含情感地夸赞古都北京所保存的代表东方艺术风格的城市规划与传统建筑。比如,他在《冰雪北海》里要言不烦地铺陈北京独有的宫殿、城圈、公园、太庙、天坛、红色的宫墙、五色的牌坊所构成的艺术美,“觉得壮丽光辉”,^{[16]233}又在《翠拂行人首》中称颂北京普通四合院的艺术性,四合院的空间构造,绿油油的屏门,院中的石榴树、金鱼缸与夹竹桃、美人蕉等,都给人美的享受;^{[16]178}在《顽萝幽古巷》中深情地回忆南京由历代保留下来的砖墙、屋瓦,认为它们带来了“荒落、冷静、萧疏、古都、冲淡、纤小、悠闲”等复杂的审美体验,就是“那些冷巷的确也能给予我们一种文艺性的欣赏”^{[16]192}。当将两都作对比时,则是“北平以人为胜,金陵以天然胜;北平以壮丽胜,金陵以纤秀胜,各有千秋”,^{[16]210}显然是把“两都”当作绘画艺术来看待了。就城市的独有资源而言,“两都”都有着丰富的历史园林与特色建筑,这些在张恨水小说叙事中的城市背景在“两都赋”里全都转化为了审美对象加以怀念、欣赏,就是在北京的秋夜里看星星都是“很有诗意的事”。^{[16]186}北京的艺术性,不仅源于北京有琉璃厂这样可供文人发思古之幽情的艺术宝库,还有那些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城市景观,都因为时空的转换,在“两都赋”中实现了艺术生成。

(三)“两都”的乡土性

从审美的立场来欣赏城市的艺术性,也使张恨水在“两都赋”中更加注重“两都”的乡土属性。乡土性与现代性似乎是城市中不可调和的对立属性,以都市物质文明与消费文明见长的“摩登”上海在现代中国独树一帜,但张恨水并不喜欢“摩登”上海的繁华与热闹,甚至在南京的“城记”中对都市现代性的描述就有所节制,而对城市的乡土田园气息着墨颇多,“试图通过构建都市乌托邦来连接和消融城乡的对立”。^[17]在没有叙事功能的《两都赋》中,张恨水进一步放大了两座都城的乡土属性,在记忆中重构中国现代都市的乡土乌托邦。

张恨水在《两都赋》中建构乡土乌托邦的努力实际上是对都市现代性的反抗与批驳,他记忆中的北京与南京都近于一种田园城市,是过滤了现代性的都城。在城市空间上,张恨水分别选取了北京的城南

与南京的城北来进行个性化的描述,突出两个都城的乡土意味。张恨水在南京时住在城北,而他创办的《南京人报》的社址则在城南,因此,他得以频繁地穿梭于南京全城而感受到南北城的差异。他明确表示要“歌颂”南京的城北,“过了鼓楼中山北路,带着两行半黄半绿的树影划破了广大的平畴,两旁有三三五五的整齐房屋,有三三五五的竹林,有三三五五的野塘,也有不成片段的菜圃和草地。东面一列城墙,围抱了旧台城鸡鸣寺,簇拥着一丛树林,和一角鼓楼小影,偶尔会有一声奇钟的响声,当空传来。钟山的高峰,远远在天脚下,俯瞰着这一片城池。”^{[16]189} 就是热闹、繁华的太平路花牌楼一带,张恨水也认为街道上的梧桐与刺槐压制着了热闹的“动乱”,不会产生上海霞飞路一带的“洋气”。竹林、树林、菜园、荒地、敞地、清凉古道等自然意象,南京城北特有的疏旷、爽达感,都使张恨水在记忆中明晰了南京的田园风光,确证了这座江南都城的乡土气息。相比之下,北京由四重城墙围合而成的都城虽没有南京一样的山水田园风光,缺乏南京一样的山水之胜,但张恨水亦能在记忆中发现北京的乡土风味。张恨水在北京先后有好几个住处,但最令他怀念的,还是北京的城南生活,他喜欢北京的田园气息,“每当人事烦扰的时候,常是一个人跑去陶然亭,在芦苇丛中,找一个野水浅塘,徘徊一小时,若遇到一棵半落黄叶的柳树,那就更好,可以手攀枯条,看水里的青天。”^{[16]195} 在重庆郊外的“待漏斋”中,张恨水念念不忘的是北京幽静的胡同,栽种着大树的四合院,亲自栽养的菊花,都走进了张恨水的乡愁旧梦。^{[16]208} 张恨水对北京的槐树尤为喜欢,一度把家里院中两棵高大的老槐当作深夜回家的坐标。^{[16]187} 他甚至称北京是“碧槐城市”,“南京是无处不见柳,北平是无处不见槐。”^{[15]392}《两都赋》对田园风光的歌颂,对乡土精神的眷恋,使北京与南京两座古老的都城在城市现代性之外找到城市气质、精神的连接点与共通点。

(四)“两都”的人文性

与城市的乡土精神相关联的是张恨水对两座都城特有的城市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发现与认同。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都,北京与南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出的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受到张恨水的喜爱,《两都赋》注重的不仅是“两都”作为都城历史文化的厚重,还有笼罩于都城历史光环下的日常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平民文化的认同。于是,张恨水在对“两都”进行历史怀古与文化记忆之外,又对都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津津乐道,比如,他十分赞赏北京人的“老三点儿”,“吃一点儿,喝一点儿,乐一点儿,就无往不造成趣味”。^{[16]182-183} 张恨水兴致勃勃地回忆在北京的胡同生活,冬季深夜屋内煤炉上“水壶的响声”能带来写作的文思,^{[16]217} 胡同里“唱曲儿的”与“胡琴弦子鼓板”的声音能激发写作的灵感。^{[16]172} 此外,他在《碗底有沧桑》中写在南京夫子庙畔吃早茶的趣味,在《风飘果市香》里写中秋时节逛北京水果市场的轻松、愉悦,在《风檐尝烤肉》中回味在北京吃松柴烤肉的情景与风趣,在《市声拾趣》中回忆北平小贩幽默与凄凉的哟唤声所营造的“情调非常之美”,在《翠拂行人首》中亲切地称北平的四合院是“小小住家儿的”,无不流露出对“两都”市井街头所呈现的平民文化品格的深深眷恋。《两都赋》所呈现的北京与南京的日常生活,没有突出“两都”作为古都的厚重历史感与作为都城的崇高感,也没有渲染“两都”的都市现代性,而是在记忆中喃喃诉说着“两都”传统、安逸的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文化。

(五)作为记忆的“两都”

张恨水以《两都赋》为代表的记忆散文,在“双城记”之外另辟新径,书写了另一部现代中国的城市文化史。如果说“双城记”呈现了现代北京与南京的社会空间,借助通俗文学的叙事手法表现了现代都市的人物命运,那么“两都赋”则是对两座都城现代性的反思,进而发掘都市自身的美学与人文特征,营建了“两都”的文化空间。在“两都赋”中,张恨水以一个普通市民的眼光来观察、体验、感受两座都城的城市空间、生活方式,无论是北京的幽静、闲适,还是南京的疏旷、风韵,都显示出“两都”远离都市现代性的乡土气息、艺术风格与人文气质。然而,张恨水并不是一味地拒绝都市现代性,相反,他“享受着现代生活所带来的便利,沉迷于它所带来的幸福与安逸”。^{[18]151} 不论是北京四合院中的电灯、煤炉、自来水,还是南京城南的繁华,张恨水都坦然处之。张恨水心目中理想的都市,是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民俗、

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复合体,因此,他津津乐道着北京的“北平风味”,念念不忘于南京的“六朝遗风”。

张恨水在物质匮乏、生活困顿的“后方”重庆追忆“两都”,表明“两都赋”背后隐藏着一部“三都赋”,重庆虽然没有被凸显,但一直是张恨水记忆北京与南京的当下参照。在战时重庆书写和平年代的北京与南京,是张恨水在国家与民族受到外敌入侵的情形下,被长期压抑的爱国情绪与民族心理的感性释放。张恨水在《两都赋》的“序言”中明确表示,关于北平与南京的记忆含有“北马思乡之意”。^{[16]170}此时,流落于西南一隅的张恨水把北平与南京视为自己的故乡,显然是他在“两都”失去了政治象征功能之后的心理补偿,即在抗战小说的宏大叙事之外,通过个人化的情感追忆,将对“两都”的热爱与留恋不动声色地融入了抗战文学的潮流之中。他反复宣告,“住家,我实在爱北平!”他在陪都追忆曾在“两都”的生活“是人在福中不知福”。^{[16]171}张恨水饱含情感地歌颂艺术化、乡土化、日常生活化的“两都”,并不仅是为了建构现代中国的都市乌托邦,还为了在颠沛流离中重圆自己的家国之梦。“两都”的追忆,实则是家国情怀的隐现。

三、北京与南京的时空体

时空体是前苏联学者巴赫金在研究长篇小说的话语形式时提出一个理论范畴,它强调的是文学研究既要注重空间性,还要注重空间因素的社会历史的多样性、个性与特质。^{[19]269-270}因此,我们对张恨水作品中北京与南京的城市空间的考察,还应结合不同历史时期张恨水的创作处境、外部环境,将其文学创作视为一个完整的时空体。不论是张恨水对“城”的现实主义记录,还是对“都”的赋体铺陈,都应将时间因素考虑进来,在时间性的要素下考察张恨水的城市空间书写所构成的城市时空体。

(一) 迁都前的北京叙事

在现代城市文学书写中,除了老舍笔下的北京呈现出历时性的空间变迁外,其他作家笔下的城市大多是即时、印象式的,比如林庚所观察的“南京马路长,上海人最忙,杭州山水好,北平最凄凉”就是一种印象式的表达。^[20]张恨水在陪都重庆时所观察的城市则带有明显的社会内容,“在下江人的心目中,北京是首善之区,上海是一个繁华梦,南京是民族意识中的首都,重庆则充满着拜金主义”,^[21]观看的立场由在民初北京的报社记者变为在南京的过客,再变为在重庆避难的“下江人”。张恨水观察城市的时空一直在转移,使其笔下的城市空间呈现出历时的变化。

1919年,北京爆发了影响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同年秋,张恨水来到北京,未及赶上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浪潮,张恨水最初住在北京城南的歙县会馆、潜山会馆,随后,入《益世报》做助理编辑,开始了他的新闻记者生涯,自此设定了他观察北京社会的特殊视角。从1924年《春明外史》开始正面写北京,1932年《满江红》写南京,到1939年《八十一梦》中最后两篇关于北京与南京的短篇小说,这二十余年间,张恨水从北京到南京再到重庆、成都,中间还经历了故意为之的西北考察之行,时间推移与空间旅行改变了张恨水书写城市的视角;这期间,北京由民国国都到降格为地方城市成为故都,南京则由一个历史古都成为民国新都,偏居西南的重庆在抗战后成为临时陪都,这些变迁的外部空间环境既是张恨水的描写对象,又是影响张恨水创作的社会现实。

1926年,张恨水写了一组名为《未来的北京》的杂文发表在《世界晚报·夜光》上,前后计11篇,设想北京社会未来的变化,内容涵盖北京的市政建设、娱乐消费、就业、物价、政府政治、平民生活等方面,“用过去的事实,映证现在的事实,更推进一步,说到将来。”^{[22]107}彼时北京是民国的国都,正值国都现代化建设的转型时期。^[23]在国都时期,对社会政治的新闻式观察与对现代性的追求是张恨水观察、书写北京的主要立场,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为代表的小说都围绕这一立场来编织故事。在这一时期,张恨水站在一个外乡人的立场把北京看成是国家的首都,而不是一个作为地方城市的北京,因此,在民国初年北京作为国都的背景下,张恨水关注的北京城市空间大多是市政改造与建立的新型娱乐消费空

间,都是上层社会、文人阶层活跃的城市空间,而不是平民生存的城市角落。这就与同样以描写北京著称的老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并不表明张恨水强烈地赞同现代都市文明,张恨水对北京都市现代性的观察与体验,有一个明显的时间性界线。有学者认为:“民国十年(1921年)至十八年(1929年)北京的社会万象,才是《春明外史》所要表现的主要内容。”^{[24]182} 还有学者认为张恨水早期的北京小说描绘了“一幅有时间性的地图”,^[25]后来张恨水在回忆《春明外史》时甚至反思这种写作策略:“我太着重那一段的时间性。文字自不能无时间性,但过于着重时间性,可以减少文字影响读者的力量。”^{[5]43-44} 张恨水试图突破时间性的限制来达到空间性永恒充满了困难,他后来的北京书写也印证了这一点。

(二) 迁都之后的“两都”想象与记忆

国都南迁至南京之后,张恨水的北京书写策略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开始感叹于北京被“打入冷宫,废为庶人”,^{[26]47} 历数国都南迁后北京的惨状,随后又接连在《世界晚报·小月旦》上发表杂文,关心北平的市政建设,大凡街道卫生、城市供水、电灯、交通等,商人的艰难、车夫的可怜,失业的平民,都加以关注;又以快照的方式鸟瞰“旧都”的“城市依然,人民已非”,^{[15]181} 以一个报人的视角冷静地观察、评说着北平的落寞,语多无奈。1935年,张恨水为马芷庠编著的《北平旅行指南》作序,表示愿为介绍北京旅行指南“画一轮廓”,^[27]序二足见其对北京情感的变化。北京由国都成为“旧都”后,张恨水的北京书写由前期的注重都市现代性、政治符号性转身对北京城市的地方、审美性与人文性。在小说中,张恨水加强了对北京下层社会、普通平民的叙述,由早期的宏大叙事向表现小人物的微小叙事转变,诸如写北京贫民的《天上人间》《美人恩》《夜深沉》,写城市青年的《天河配》《艺术之宫》《过渡时代》等,都显示出书写趣味的转变;在散文中,张恨水开始关注北京城市的审美属性,歌颂北京的城楼、宫苑等历史文化遗产,畅谈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的优点,发现北京日常生活的美感,一度把北京当作自己故乡,早期作为外乡人的北京空间体验与视觉惊奇,在避居重庆之后成为挥之不去的乡愁。至1948年,张恨水在经历了上海、南京、重庆、成都等城市的生活体验后回到北京,称赞北京是“一座富于东方美的大城市”,^[28]算是他对北京的总评之论了。

1936年,由于北京形势日趋紧张,张恨水举家南迁,将家眷送回故乡安徽,自己则选择留在南京,并创办了《南京人报》,“并非‘爱住金陵为六朝’,实在有其不利己在。”^{[29]366} 相比在北京的生活经历,张恨水在南京生活的时间要短很多,查《张恨水年谱》,^[30]张恨水在1936年正式定居南京之前,只有1933年曾在南京有约一个月的短住,其余只是在往返于故乡与北京、上海之间在南京有短暂的逗留,可见,张恨水在1936年之前的南京生活体验还称不上丰富。1937年底,因南京形势紧张,张恨水主办的《南京人报》停刊,他本人也离开南京沿江而上,结束了一年多的南京办报生活。张恨水在南京的生活前后总共不过一年之余,除了《泪影歌声》(1937,未完成)是写于南京之外,其他写南京的作品或写于北京,或写于重庆,都是想象与记忆之作,因此,张恨水笔下南京的时空体显得相对稳定,不似北京那般前后存在巨大差异。

张恨水到南京时,南京已是民国的“新都”,正值人口汇集、城市建设大兴土木、现代化进程如火如荼之时,随着《首都计划》《市区建筑暂行简章》等政府规划的出台,南京在城市建设上主张“农村化”“艺术化”“科学化”。^[31]耐人寻味的是,张恨水的南京书写并未采取早期北京书写的策略,没有将都市现代性作为叙事的主要目标,也没有刻意关注上层社会的政治逸事与豪门秘闻,而是着重呈现南京的历史遗韵、平民阶层与乡土气息,在《丹凤街》《秦淮世家》《石头城外》等小说叙事与《两都赋》的散文描写中,基本都遵循了这种书写策略。有所不同的是,由于作者在南京时已面临外敌入侵的风险,因而作为“新都”的南京就难免让人产生民族国家的想象,对南京的政治象征功能有所期待。张恨水初至南京时,因为觉得“南京士大夫阶级,很能保持‘六朝金粉’的作风,看他们的憩嬉无事,不亚于上海”,^{[5]75} 对南京产生了不好的印象。因此,在描绘南京的都市乡土性之余,张恨水又试图通过强化南京的历史性、平民性来充实南京书写的政治意味。在《秦淮世家》中,张恨水通过汪老太、唐大嫂、唐小春三个不同时

代在秦淮河上卖艺的女人来象征南京的历史变迁;《丹凤街》中诸如杨大个子、童老五等不知名的商贩、平民在官员赵次长的迫害之下最后都加入了南京的壮丁训练,成了积极抗战的民族英雄。可见,在张恨水的南京书写背后隐藏着国家主义的意识,他对南京这个“新都”的不满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认为南京逃不出“温柔乡”的历史命运,反对再建都南京。^{[29]366}无论是在南京的现时书写还是在重庆时的战时记忆,张恨水笔下的南京在平民立场之外都带有一定的国家意识,融合了“六朝金粉”与民国“新都”的双重想象。

(三) 城市时空体

从北京城南的会馆到南京城北的唱经楼,从北京的胡同到南京的“冷巷”,从北京的八大胡同到南京的秦淮河,不论是居住空间还是社会空间,张恨水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体验、观察、书写着北京与南京这两座有着一定共性的都城。张恨水笔下的北京与南京并不是平面、僵固的形象,而是在历史的不同轴线上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形态,城市形象存在内在的张力,有学者认为张恨水的作品“显示出一个渐进的过程,即社会历史视野逐渐扩大,与时代联系日益紧密,现实主义精神日趋强化”,^[32]实际就是对张恨水笔下城市时空体的另一种概括。在现代中国的数十年历史变迁中,军阀的混战,现代性的渗透,政治中心的转移,都影响着张恨水北京、南京书写的叙事策略与价值取向,进而影响二者时空体的生成。

时空体的观察视角能发现张恨水对于都市现代性的特殊态度。从“城”的记述而言,张恨水早期的小说突出的是北京与南京在现代中国的都市现代性。在描绘城市空间、社会空间的基础上,分别分析了“双城”的政治语境、社会形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通过突显不同的城市风物与市民,使“双城”都表现各自的独特风貌。张恨水早期的散文、杂文亦以都市现代性与国家政治想象为立场,作为观察、评价“国都”社会的主要价值标准,比如,他认为“北京的世界,说是官世界,其实是少爷世界”,^{[33]67}细致地剖析国都北京的社会结构。但张恨水又以在北京现代化的沥青马路上看到古老的骡车,认为“天演论不适于北京”,^{[33]68}对北京的城市现代性表示怀疑;至后期以《两都赋》为代表的散文则对北京与南京两座现代“都城”进行了想象性重构,在淡化“两都”现代性与政治符号性的同时,放大了两者的审美性、乡土气息与人文精神,“两都”时空体前后的变迁路径亦很鲜明。

可以说,张恨水笔下北京、南京时空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都市现代性的抵抗,也表明了他对现代都市文明的鲜明态度。与对北京、南京的时空体的复杂性相比,张恨水对代表着现代都市文明的上海一直持批评的态度,他曾明确表示:“我以为上海几百万人,大多数是下面三部曲:想一切办法挣钱,享受,唱高调。因之,上海虽是可以找钱的地方,我却住不下去。”^{[5]68}上海在张恨水的眼中始终是“洋”“外来”的代表,从他对上海的物质化、消费化、利益化的批评看,从他对北京、南京的城市遗产、城市文化与乡土气息的赞许看,张恨水对都市现代性的批判立场是基本成立的,因而有人认为,“在三十年代,张恨水很可能是当时中国对都市物质文明带来的‘异化’最敏感的作家之一。他看到现代文明束缚人的自然本能,繁华的市面掩盖着一个虚伪的世界。”^[34]在与批评上海的对比中,张恨水指出了北京与南京在抵抗现代性上的共通性。如果试图通过城市的时空体来看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无疑是一个观察现代中国的特殊窗口,但张恨水似乎却不太愿意去打开这扇窗户,而更热衷于书写北京与南京这样更保守、更具乡土气息的传统都城,去观察、体验、发现传统都城在现代性渗透后的矛盾与张力。

1939年,张恨水在重庆完成了包括23篇中篇小说的《八十一梦》,其中一篇写北京,一篇写南京,北京是梦回民初国都时期,南京则想象抗战胜利之后,这两个短篇,可以视为张恨水笔下北京、南京时空体的定型之作,是张恨水经历了北洋军阀混战、国家内战、抗日战争等不同历史阶段后重新记忆、想象两座都城的产物,对民初北京的回忆与对抗战胜利后南京的展望使张恨水笔下北京、南京的时空体成为窥视现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为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提供了另一个参照的维度。

四、结 语

从空间的角度考察张恨水笔下的北京与南京,能发现新闻记者眼中独特的现代中国“双城记”与“两都赋”。张恨水的北京、南京书写跨越了较长的历史阶段,从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一直延续到国内战争,前后跨越近三十年,从时间性的角度分析张恨水笔下北京、南京在不同时期的呈现与记忆变化,能提供我们对现代中国城市、社会、文化的不同认识。张恨水笔下北京与南京的时空体,暗含着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转型与变迁。重新审视张恨水笔下北京与南京的时空体,对他笔下的城市空间与时间、历史性进行综合考察,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新的衡量、评价张恨水作品的框架,即不再以“革命史观”或“启蒙”为主要的评价标准,而是把张恨水的创作放到城市/乡村、现代/传统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中来评判,这样既可以避免简单地把他划入“鸳鸯蝴蝶派”或是都市言情作家之列,也有助于重新认识张恨水在文学史上的真正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 关于张恨水的城市写作,学界已取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平原.作为“北京文学地图”的北京小说[J].文史知识,2014(10);周成荫.城市制图:新闻,张恨水与二十年代的北京[J].书城,2003(12);季剑青.过眼繁华:张恨水的北京叙事——从《春明外史》到《啼笑因缘》[J].文艺争鸣,2014(8);凌云岚.垃圾堆上放风筝——张恨水小说中的北京城市贫困空间[J].北京社会科学,2018(8);袁昊.民国城市书写:《丹凤街》与南京[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卞秋华.张恨水小说中的南京书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4);李永东.论陪都语境下张恨水的重庆书写[J].中国文学研究,2009(4);朱周斌.张恨水作品中的乡村与城市[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
- [2] 关于近代北京的城市改造与现代化建设,可参见袁熹.北京城市发展史(近代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 [3] 张伍.我的父亲张恨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 [4] 季剑青.过眼繁华:张恨水的北京叙事——从《春明外史》到《啼笑因缘》[J].文艺争鸣,2014(8).
- [5] 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
- [6] 张恨水.丹凤街[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
- [7] 徐志摩.“死城”(北京的一晚)[J].新月,1929(11).
- [8] 宋海东.张恨水小说图志[M].扬州:广陵书社,2019.
- [9] 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10] 张恨水.满江红[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
- [11] 陈平原.作为“北京文学地图”的北京小说[J].文史知识,2014(10).
- [12] 在现代中国的不同时期,“北京”有时亦称“北平”,为叙述之便,本文除在专指时称“北平”外,其余均用“北京”.
- [13] 下文讨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张恨水的《两都赋》,还包括张恨水书写北京与南京的其他散文,因而泛指时用“两都赋”,专指则用《两都赋》.
- [14] 张恨水.似水流年[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
- [15] 张恨水.张恨水散文:第二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
- [16] 张恨水.张恨水散文:第一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
- [17] 卞秋华.张恨水小说中的南京书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4).
- [18] 朱周斌.张恨水作品中的乡村与城市[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
- [19]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 [20] 林庚.四大城市[J].论语,1934(49).
- [21] 李永东.论陪都语境下张恨水的重庆书写[J].中国文学研究,2009(4).
- [22] 张恨水.明珠[M]//张恨水散文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 [23] 民国初年任内务部长的朱启钤主导了北京城一系列的现代化改造工程,参见史明正. 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M]. 王业龙,周卫红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24] 解玺璋. 张恨水传[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 [25] 周成荫. 城市制图:新闻张恨水与二十年代的北京[J]. 书城,2003(12).
- [26] 张恨水. 张恨水散文:第四卷[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
- [27] 马芷庠. 北平旅行指南[M]. 北平:经济新闻社,1935.
- [28] 张恨水. 五月的北平[J]. 子曰丛刊,1948(2).
- [29] 张恨水. 上下古今谈[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
- [30] 谢家顺. 张恨水年谱[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
- [31] 董佳. 首都营造与民国政治:南京《首都计划》研究[J]. 学术界,2012(5).
- [32] 周斌. 张恨水与市民文化[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
- [33] 张恨水. 小月旦[M]//张恨水散文全集.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 [34] 袁进. 张恨水评传[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The Tale of Two Cities” and “Fu of Two Capitals”: on the Time-Space Body of Beijing and Nanjing in Zhang Henshui’s Writings

Wang Qi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11, China)

Abstract: “The Tale of Two Cities” formed by Beijing and Nanjing in Zhang Henshui’s novels shows the different urban landscapes and social spaces of the two ancient cities, and outlines the unique connection between “city and people”. In *Fu of Two Capitals*, Zhang Henshui explores the aesthetic and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Beijing and Nanjing, and builds a cultural space of “Two Capitals”, showing the rustic atmosphere, artistic style and humanistic temperament of the two capitals far removed from urban modernity. Taking into account Zhang Henshui’s creative situation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Beijing and Nanjing in Zhang Henshui’s works can be regarded as a time-space body which impli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s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history, and culture.

Keywords: Zhang Henshui; Beijing; Nanjing; the time-space body

[责任编辑:左福生]